

四川大学考古学研究丛书



宋治民考古文集

宋治民 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宋治民考古文集

宋治民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文集选出论文 30 篇,分为巴蜀文化考古、西南夷考古、汉代考古和带有思考性的文章四个部分。分别探讨了蜀文化的渊源、分期,巴文化的渊源、分期,巴蜀文化中外来文化因素分析,早期蜀文明;石棺葬和大石墓的分期、年代、族属,石棺葬出土器物的文化因素分析,云南西部青铜文化墓葬的分析;汉代屯田、铜器铸造手工业、新野画像砖墓、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等方面的一些问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治民考古文集/宋治民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ISBN 7-03-012414-6

I. 宋… II. 宋… III. 考古学 - 中国 - 文集 IV. K8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0611 号

责任编辑:闫向东 霍杰娜 / 责任校对:宋玲玲

责任印制:钱玉芬 / 封面设计:黄华斌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未经本社许可,数字图书馆不得使用。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4 年 2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04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2 3/4 插页:1

印数:1-1 500 字数:519 000

定价:8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宋治民 河南省郑州市人，生于1931年12月。1956年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次年进入考古专业。1960年秋毕业，分配至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92年5月离休。1993年12月受聘为四川大学历史系特邀教授。历年所授课程有考古学通论、战国秦汉考古、西南考古、田野考古概论及多门专题课。现从事巴蜀文化研究。

前言(自序)

2001年12月14日是我70岁生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和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为祝贺我的生日，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座谈会。在成都的校友都赶来参加了座谈会，外地的校友也纷纷发来传真、电报表示祝贺。我对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和各位校友表示衷心地感谢。

座谈会上四川大学考古系和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决定为我出一本文集，使我很感动，也很惭愧。几十年来我写过一些文章，但质量高的并不多，不过是反映了我学习的心得和体会，反映了我在教学、研究中所走过的路程。希望有些地方对年轻同志有所帮助，而不足之处，则可引以为戒，并请批评指正。

一

我于1956年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二年级时经考核进入考古专业（当时称考古专门化）。时任西北大学校长的侯外庐先生在给历史系学生作学术报告时说道：希望你们毕业后，10年内不要看到你们的文章，要坐冷板凳、面壁，就是坐下来好好读书。时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林冠一先生在讲授历史文选课时，结合讲课提到收集资料的重要，常讲读书要随时做笔记、做卡片。讲授中国古代史的陈登原先生经常讲读书做卡片，说道，你一天做一张，一年就是360张。这些史学界的前辈都要求要坐下来读书，掌握资料。1960年毕业，分到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任教，在冯汉骥先生指导下工作和学习。

冯先生经常说，讲课是一门艺术，要提高教学质量，必须进行科研，不搞科研就不能提高教学质量。冯先生主张读书要读原著，读发掘报告。先生说学习要博而精。几位前辈的教导，我今日记忆犹新，在我的教学、研究工作中受益匪浅。

二

在冯汉骥先生的指导下，我一边准备教学一边读书，深感读原著的必要。阅读原著才能对一些事情的前后发展、左右联系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就拿西

汉前期货币的演变来说，这实际是西汉王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在经济、政治领域中的较量。从高后铸造八铢“半两”钱开始，直到武帝元狩五年铸造“五铢”钱，经过几次反复才最后基本上稳定了汉代的货币制度。这期间虽有其他原因，但最终还是西汉王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争夺铸币权的斗争，没有稳定的经济作为基础，也就没有政治上的统一。只有读原著，才能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

读发掘报告也一样，一本发掘报告全面地记录了一个遗址或一处墓地的情况。阅读中以地层学和类型学的角度观察一个遗址或墓地早晚之间发生的变化，也通过这种变化更加深对这两个最基本方法论的理解，同时也全面了解这个遗址或墓地的文化面貌。这样报告读的多了，认真做笔记和卡片，自然就积累了资料。掌握资料多了，就会对一些问题形成自己的看法，对一些发掘报告的某种提法和见解是否正确、科学，也会有自己的看法。例如，收入本文集的《略论四川战国秦墓的分期》、《略论四川的秦人墓》、《关于蜀文化的几个问题》、《早期蜀文化分期的再探讨》、《广汉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几个问题的探讨》、《三叉格铜柄铁剑及相关问题的探讨》、《试论蜀文化和巴文化》等文章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

我国汉代，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都非常丰富，进行汉代考古学的研究除了坚持运用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论，还必须结合有关的文献材料。如《论新野樊集汉画像砖墓及其相关问题》、《汉代货币的演变及其相关问题》、《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两个问题》等文章。

在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研究中，必须坚持以考古材料为主，运用考古学的方法论进行研究，结合文献材料是为了更好地通过考古材料的研究来复原当时的历史面貌，而不仅是以考古材料证史、补史。用考古材料“证经补史”是历史学家研究古代史的方法之一，无可厚非，但考古学是通过考古材料的研究来说明古代历史，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的方法和历史学（指狭义的历史学）都不同，因此考古学的研究应体现考古学的特点。通过考古学的研究取得的成果和文献资料一致，这样最好，说明研究结论正确，文献资料可靠。如果通过考古学研究的结果和文献记载不一致，这就要作仔细认真的分析，既不能轻易改变考古学研究的结论，也不能轻易否定文献记载，要找出其中的原因，尽量给予科学的解释。例如，在对古代蜀文化的研究中，考古的发现和研究表明蜀人是成都平原上土生土长的，他们渊源于成都平原上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并且发展脉络基本清楚，和《蜀王本纪》等文献资料不同。《蜀王本纪》一书是后人根据传说整理而成，虽然其中有历史的素地（尹达语，见《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5页），却也难免含

有神话的色彩,在传说流传的过程中也可能会添加新的内容,甚至会受整理者观点的影响。顾颉刚先生在《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一书中指出:“这一段记载,一看便可知道是神话的堆积,然而可信为真正汉代四川民间流行的蜀国传说给扬雄(?)忠实地记录下来的”(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81页)。考古材料则是通过田野发掘获得,通过考古学的方法论进行整理研究,其结论应是可信的。又如汉武帝实行冶铁手工业的国营政策,受到一些非议,主要是说铁器质量差,不合民用、价钱贵等。而考古发掘的属于西汉实行冶铁业国营以后的冶铁作坊遗址,从出土铁器看,主要是农具,经过科学检测的一部分铁器,其成分有铸铁脱碳成钢、可锻铸铁等,这些都是当时最优良的材料,他们的质量并不差,亦合民用,和文献的一些记载并不一致。我们处理这些问题,要了解当时的背景,看攻击汉武帝盐铁政策的是哪些人,他们代表哪一部分人的利益,便不难发现这背后也反映了西汉后期中央集权和地方势力的斗争,所以,不能轻易相信攻击盐铁政策的人的言论。那么,考古出土的当时的冶铁作坊遗址和铁器是最有说服力了。

三

除以上各方面外,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必须重视田野工作,尽量多参加田野调查和发掘,做好室内整理,编写发掘报告。考古学的基础是田野考古,没有田野考古就没有考古学。考古学研究是包括了田野调查和发掘、室内整理、编写考古发掘(调查)报告、综合研究这几个环节。考古学的研究不仅是综合研究,从田野调查和发掘开始就是研究的开始,所以必须重视田野工作。通过发掘和整理,在地层学和类型学这些基本方法论指导下,通过实践丰富和加深对考古学方法论的认识和理解,然后将发掘出的遗迹和遗物整理成发掘报告。经过反复的这种实践、认识,科学地处理好复杂的地层关系,处理好多变的遗迹、遗物、类型学发展演变关系,就提高了识别遗迹、遗物时代的能力,提高识别不同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能力,提高识别一个遗址或墓地不同文化因素的能力,也就是提高了研究的能力。当然这些都不是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但是这些都是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只有也只能通过这些看似繁琐的研究工作,才能最终复原古代人们的社会历史,这需要许多研究人员的努力,需要许多代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今天在考古学研究领域里取得的成果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的,我们今天的研究成果又是为后人的研究打下基础。所以不能轻视这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在考古学研究中舍此而无其他捷径,而一些综合性的研究成果在整个考古学研究中其实

也只是基础性的研究。

四

收入本集的文章，按其内容分为：巴蜀文化考古、西南夷考古、汉代考古和带有思考性的文章这四部分。每个部分再按发表年代（或写作年代）的先后排列。

所收文章除了明显的错字外，一律不作修改。其中有一些问题的看法前后不一致，当以后者代表我的观点。这种前后观点的改变表示了我在学习中对一些问题认识的变化，这也是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难免的。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
赞助出版

目 录

前言	(i)
----------	-----

巴蜀文化考古

略论四川战国秦墓的分期	(1)
关于蜀文化的几个问题	(15)
略论四川的秦人墓	(28)
早期蜀文化分期的再探讨	(39)
四川战国墓葬试析	(53)
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二号祭祀坑几个问题的探讨	(70)
早期蜀文化与商周文明	(85)
蜀文化尖底陶器初论	(93)
巴蜀文化墓葬某些文化因素之分析	(105)
什邡、荣经船棺葬墓地有关问题探讨	(118)
试论蜀文化和巴文化	(133)
试论四川温江鱼凫村遗址、新津宝墩遗址和郫县古城遗址	(154)
略论广汉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及相关问题	(167)

西南夷考古

四川西部石棺葬和大石墓的几个问题	(179)
试论川西和滇西北的石棺葬	(189)
云南西部地区一些青铜文化墓葬的初步讨论	(202)
三叉格铜柄铁剑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214)
四川茂县牟托 1 号石棺墓若干问题的初步分析	(225)

汉代考古

汉代铭刻所见职官小记	(241)
居延汉简中所见西汉屯田二、三事	(244)
关于汉代军队编制的几个问题——兼与贺官保等同志商榷	(251)

关于缪宇官职的讨论二则	(258)
汉代的铜器铸造手工业	(261)
汉代货币的演变及其相关问题	(275)
论新野樊集汉画像砖墓及其相关问题	(289)
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两个问题	(302)
成都市青白江跃进村西汉墓三题	(310)

其 他

四川先秦时期考古研究的问题	(320)
战国秦汉考古研究的思考——为庆贺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 35 年而作	(327)
巴蜀文化与周边文化关系研究中的相关问题	(338)
宋治民考古论著目录系年	(343)
英文提要	(347)
后记	(349)
跋	(350)

Introduction

Preface (*i*)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phas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burials in Sichuan (*1*)

Sever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Shu Culture (*15*)

Brief discussions of the Qin burials in Sichuan (*28*)

Re-discussion of the phases of the early Shu Culture (*39*)

Preliminary discussion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burials in Sichuan (*53*)

Exploration of the several issues of the No.1 and 2 ritual pits of the Sanxingdui site, Guanghan (*70*)

The early Shu Culture and the Shang-Zhou civilization (*85*)

Preliminary discussions of pointed bottom pottery in the Shu Culture (*93*)

The analyses of some cultural factors in the Ba and Shu Culture burials (*105*)

The exploration of some related issues of the boat-coffin cemeteries in Shifang and Rongjing County (*118*)

Discussions of the Shu Culture and Ba Culture (*133*)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the Wenjiang Yufucun site, Xinjin Baodun site and Pixian Gucheng site in Sichuan (*154*)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the Guanghan Sanxingdui site Phase I Culture and its related issues (*167*)

Several issues of the stone coffin burials and large stone tombs in western Sichuan (*179*)

Discussion of stone coffin burials in western Sichuan and northwestern Yunnan (*189*)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some bronze culture burials in western Yunnan (*202*)

Discussion of trident bronze handle iron swords and their related issues (214)

The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some issues of the No.1 stone coffin tomb in Muotuo, Maoxian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225)

Brief records of office positions according to the Han Dynasty inscription (241)

Some discussions of the Western Han military field according to Juyan strips (244)

Some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 Han Dynasty military system-discussions with He Guanbao (251)

Two discussions related to the office position of Miuyu (258)

The bronze casting industry of the Han Dynasty (261)

The evolution and related issues of the Han Dynasty currency (275)

Discussion of Xinye Fanji Han Dynasty relief bricks and related issues (289)

Two question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Chu King tomb in Shizishan (302)

Three issue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ombs in Yuejin Village, Qingbaijiang Township, Chengdu City (310)

The problems of the Sichuan Pre-Qin perio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320)

Thinking of the Warring States, Qin and Han perio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327)

The related issues of cultural relationships among Ba Shu Culture and their adjacent cultures (338)

Professor Song Zhimin's archaeological publications in chronological order (343)

Abstract (347)

Postscript i (349)

Postscript ii (350)

巴蜀文化考古

略论四川战国秦墓的分期

今天的四川，在古代生息着不少兄弟民族，巴人和蜀人是其中较大的两支。大体言之，以现在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为巴人的主要活动区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为蜀人的主要活动区域。

秦惠文王初元二年（公元前 329 年），秦举巴蜀^①，置巴郡和蜀郡。

已发表的四川战国—秦这一段的考古材料，主要为巴人和蜀人的文化遗迹和遗物。其中除《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一书外，其他材料都比较分散和零星。本文就这些材料试作初步的墓葬分期。

一、巴人墓葬

主要材料为巴县冬笋坝、昭化（现属广元）宝轮院及涪陵小田溪发掘的巴人墓葬。

（一）冬笋坝和宝轮院墓葬

1954～1957 年，前西南博物院和四川省文管会在冬笋坝和宝轮院发掘清理了几批古墓葬，共计 97 座，其中属于船棺者 30 座，狭长坑墓 20 座（包括残墓 2 座），其余为长方坑、方坑墓和砖室墓^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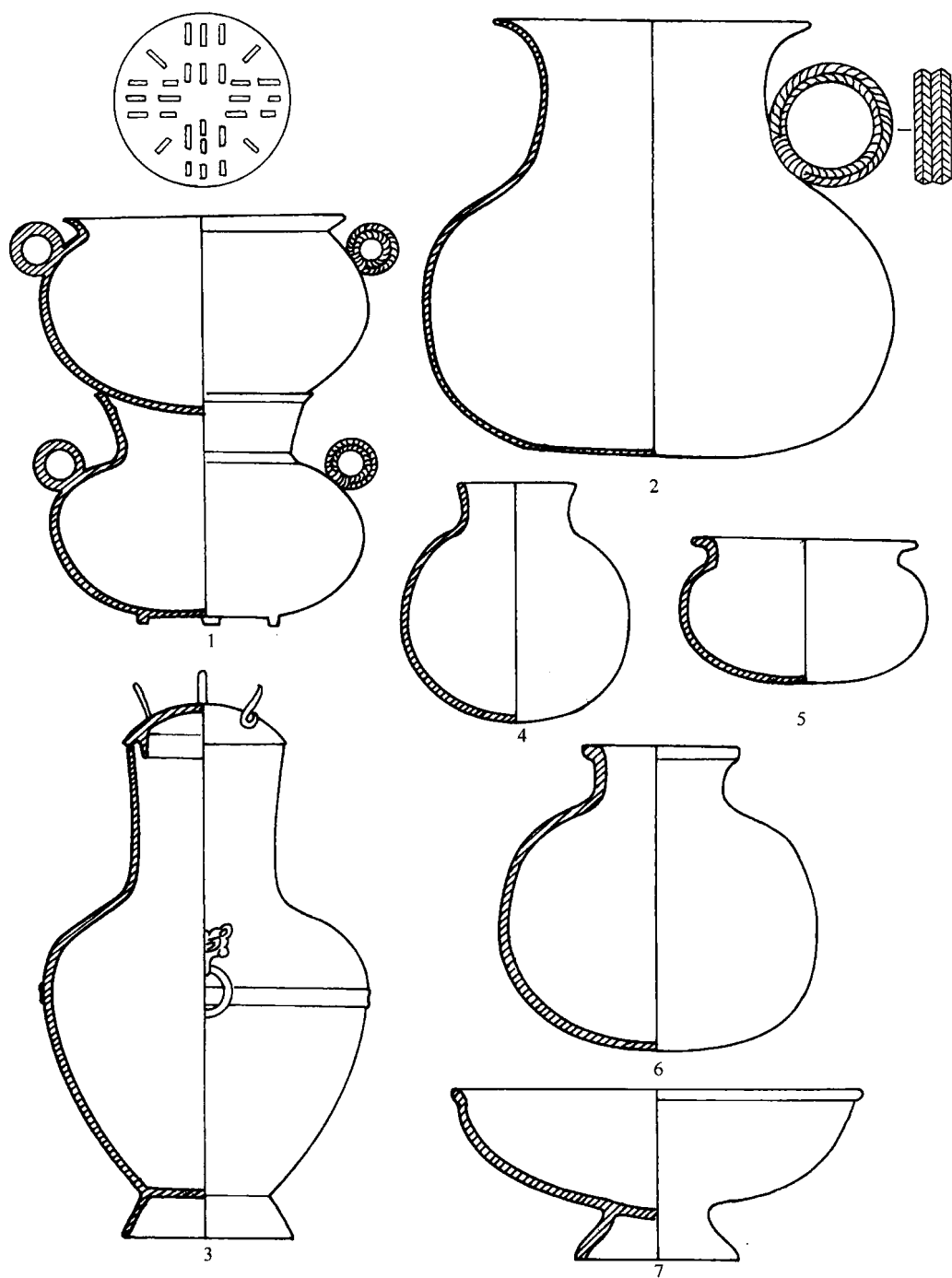
船棺为一独木舟，墓坑视船棺大小掘一狭长形竖穴土坑。狭长坑墓的墓坑比船棺墓的墓坑稍短而宽，不用船棺而用木槨。

《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一书将船棺墓分为两期。

第一期：原报告认为相当于公元前 4 世纪末，即秦举巴蜀前后。现定为战国晚期，即秦举巴、蜀以后。

墓坑为狭长形竖穴土坑，如冬笋坝 9 号墓，墓坑长 6.64、宽 1.49 米。葬具以独木舟为棺，尸体和随葬器物放在独木舟仓内。随葬器物中，陶器以圜底罐和豆为主，还有陶釜。铜容器以釜、甑、釜为主，盘次之，壶只 1 件。铜兵器以钺和巴式剑为主，矛和戈（无胡）均很少。其他有铜印章。

陶器中的圜底罐为小口、短颈、圜底（图一，4、6）；豆为浅盘大口，下为喇叭形圈足而无豆把（图一，7）。这两种陶器少见与其他地区，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陶



图一 第一期巴人墓葬器物图

1. 铜甗 (宝轮院) 2. 铜釜 (冬笋坝) 3. 铜壶 (冬笋坝 M11:12) 4. 陶罐 (宝轮院 M10:15)
5. 陶釜 (冬笋坝 M18:14) 6. 陶罐 (宝轮院 M10:2) 7. 陶豆 (冬笋坝 M4:14)

釜为敞口、鼓腹、圜底，有的有短颈（图一，5），这类陶釜见于西安半坡战国晚期墓（图二，4、5）、陕西耀县战国末期墓以及河南郑州岗杜战国晚期墓^③。

铜容器基本上都是带有地方色彩的器物（图一，1、2）。但在冬笋坝 11 号墓中出土的一件铜壶，长颈较直，圆肩，最大径在腹上部、向下腹壁内收，圈足，有盖，盖上有三纽，肩部二铺首啣环（图一，3）。为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器物，这种器形显系从外地传来。这件铜壶的形制，与长沙左家公山、仰天湖、丝茅冲等战国晚期墓出土的陶壶颇为相似^④。

根据以上情况，第一期船棺墓的时代应定于战国晚期，即在秦举巴蜀以后为宜。

第二期：原报告认为约公元前 3 世纪，即秦举巴蜀以后，下限包括秦统一，少数可达西汉初年。现定为秦代墓。

墓坑仍为狭长形竖穴土坑墓，如冬笋坝 50 号墓，墓坑长 5、宽 1.2 米。葬具除前一种形式外，有一部分在船棺之内另加一小棺，即在船棺仓内另置一小棺（如宝轮院 3、6、11、12、14、15 号墓）。尸体和随身器物放置棺内，大部分随葬器物则放在棺外的船仓内。随葬器物中，陶器仍以圜底罐和豆为主，还有陶釜，出现了一部分平底罐和陶壶。铜容器以釜、甑、釜为主，盘比第一期增多。铜兵器以钺和巴式剑为主，出现了将巴式剑加以改装的情况（如冬笋坝 50 号墓之铜剑），矛和戈（有胡）仍较少。其他有铜带钩、铜镜、半两钱。新出现了铁器，印章也比第一期增多。

在第二期墓葬中有如下变化：

从葬具方面看，出现了船棺内的小棺，船棺变成了船椁，实际上形成了一棺一椁。棺椁制度在战国时期虽然受到冲击而开始崩溃，但仍风行一时并一直延续到西汉。船棺中出现这种情况，虽然是受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影响，成为向狭长坑木椁墓的过渡阶段。

从随葬器物方面看，陶器中的平底罐、壶，铜兵器中改装的巴式剑以及新出现的铜带钩等，都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至于半两钱和铜镜更给这期墓葬断代提供了证据。

关于半两钱，在《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一书的推论部分，假定为秦惠文王二年所铸，根据是《史记·六国表》秦惠文王二年“天子贺行钱”。对于这个问题曾有过讨论^⑤。主张秦惠文王二年铸半两钱者，还只是一种推想，缺乏可靠的证据。据《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的记载，一般都认为是秦统一六国之后所铸。另一方面，在关中秦的腹地，根据已经发表的考古材料，在战国时的秦墓里，尚未发现半两钱。相反在始皇陵发现秦半两数十枚^⑥，在西汉初年的墓葬里也有秦半两发现^⑦，另外在秦都咸阳也发现有半两钱，有的并和战国货币共存，但共存的还有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铜诏版^⑧。咸阳是秦在战国时期和统一六国后两个时期的都城，自然两个时期的遗存都有，虽然有些战国货币和半两共存，但是由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诏版的发现，尚不能说明在战国时秦已通行半两钱。因此半两钱应为秦统一六国后所铸的货币。

冬笋坝 42 号墓出土铜镜一面，与半两钱三枚伴出。这面镜为三弦纽，背面有凸起的弦纹三周（从图版看仅有二周），这种铜镜称为素镜。有同志将三弦纽和背面有

凸起弦纹两周的铜镜定为素镜Ⅲ式，它的流行时间为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初年^⑩。属于西汉初年的有陕西耀县、四川成都羊子山^⑪和湖北云梦西汉早期墓^⑫，都有同类素镜出土，可知Ⅲ式素镜到西汉初年仍然流行，耀县墓并有秦半两伴出。42号墓铜镜既为素镜Ⅲ式，又和秦半两伴出，自然应在秦统一之后。

综上所述，第二期船棺墓的时代应在秦统一六国之后，下限可达西汉初年。

（二）涪陵小田溪墓葬

1972年，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和涪陵县文化馆在涪陵小田溪清理了三座墓葬^⑬，原报告定为战国时期，现定为秦代墓。

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1号、2号墓均残，3号墓墓底长4.40、宽2.10米。2号墓有漆棺痕迹，3号墓有棺槨痕迹。随葬器物中，陶器多已破碎，能辨出器形的有2、3号墓的圜底陶釜。铜器主要有容器、兵器和乐器几大类。三座墓的铜容器分别为：甗、釜、甗、豆、盒、盆（1号墓）；甗、釜、釜、壶、豆（2号墓）；甗、釜、釜、壶、盒、盆（3号墓）。兵器有：巴式剑、钺、戈、弩机（1号墓）；巴式剑（2号墓）；巴式剑、钺、矛、戈、戟、弩机（3号墓）。乐器有：一套编钟、钲（1号墓）；一件编钟、钲、鐃于（2号墓）。

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来看，三座墓的时代应为同时或相去不远。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在四川流行于战国晚期和西汉。出土之陶釜有小口圜底（图二，3）和大口圜底（图二，6）两种。前者与冬笋坝、宝轮院之小口圜底罐（底有烟痕，亦用作炊器）相似，这种器形一直延续到西汉早期；后者亦与冬笋坝、宝轮院出土的大口陶釜类同。出土铜容器中之甗、釜（图二，2）与冬笋坝之同类器物相同，铜釜为大口、鼓腹、圜底，肩部两编索纹耳，也与宝轮院出土的相同。兵器中的剑、钺、矛等。与船棺墓出土的同类器物，在形制纹饰方面都相同。出土弩机均无郭（指铜郭而言），这种弩机发现在湖南长沙、常德和河南洛阳等地^⑭，均属战国时期。另外，在秦始皇陵秦俑坑发现的两批弩机^⑮，山西省榆次秦汉之际的墓葬中发现的弩机^⑯均为无郭弩机。可见这种无郭弩机的流行时间是战国迄西汉初。

再以3号墓出土的几件器物而论。错银铜壶肩腹无明显分界，椭圆形腹，最大径在腹中部（图二，1），这种壶的形制接近于战国常见的壶^⑰。铜釜，短颈、鼓腹、圜底、单编索纹耳，除了与船棺墓所出相同外，在云梦睡虎地秦墓也出有铜釜和陶釜^⑱，其中属于秦统一后（第二组墓葬）的铜釜为双耳，但陶釜则为单编索纹耳，显然是仿铜釜，可见秦代单耳釜和双耳釜同时存在。铜戈铭文为“武，廿六年，蜀守武造，东工师宦，丞业，工口”。经考订系秦始皇二十六年^⑲。

那么，3号墓的时代，上限当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后，也就是秦统一六国之后。其下限当不会晚于西汉初年。因此3号墓定为秦墓或在秦汉之际，是比较恰当的。

根据出土器物情况，1、2号墓都同于3号墓，它们应是同时代的。